



趙志強參加北京市政協會議。 本報北京傳真

趙志強：

滿文「鑰匙」還原歷史

作為一個民族學者，他30餘年如一日，用執著的民族情感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研究滿族語言和精髓，他搶救滿文，只為留住一把打開歷史真相的鑰匙。他是周總理親批，在那個特殊時期採用特殊方式培養出的特殊人才。作為全國社會科學院系統中唯一研究滿學的研究所所長，他一當就是15年，曾被稱為年輕的「老」所長。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社科院滿學研究所所長趙志強表示，北京是中國滿學研究中心，應盡快把滿文作為中華民族的物質文化遺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委員會申請加入世界文化遺產。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雲、凱雷



趙志強在選舉本溪考察期間參加筆會。



趙志強與清朝皇室愛新覺羅後裔、醇親王載灃的長孫金毓璋先生合影。

本報北京傳真

特殊年代入故宮攻讀滿文

如今，世界多國學術機構都對滿文有專門研究，而趙志強領軍的「中國隊」已將滿文研究推進到滿學研究，並把中國內地研究滿學較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共同推動滿學這一新學科的創建。

而這一切，緣自周恩來總理的囑託。上世紀70年代，會說滿語、寫滿文的人日漸稀少，一旦滿語滿文人才斷檔，就意味着清朝皇家的200餘萬件滿文檔案無人解讀。當時周總理批示，要求在北京專業研究滿語滿文的人才要達到30個，當時在北京只有9個人。為此，北京故宮博物院遵照周總理批示，開辦滿文幹部培訓班，學員是特准從北京、新疆、黑龍江等地招收的21名應屆高中畢業生，趙志強以優異的成績成為其中一學員。

1975年，「文革」尚未結束，出生於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的趙志強，平生第一次離開家鄉，踏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特殊時期的特殊人才

來京前十年，趙志強住在故宮，專心埋頭學習滿文。他說，「我們這個班的老師都是大家，像王鍾翰先生、戴逸先生、馬汝珩先生、劉炳森先生等，有周總理的囑託，中央非常重視這個班，我們也不敢有絲毫懈怠。」

傳承老師的教導，趙志強亦十分注重對細微史料的考證，曾多次到東北、內蒙古、新疆等地區進行實地考察。歷史學家王鍾翰、戴逸先生都曾對趙志強的治學和研究有過頗高的評價。

在故宮檔案堆裡工作了16年，他對滿文特別敏感，哪裡寫錯了，別人看不出來，他一眼就能看出來。2009年，作為審閱《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的專家，當這套20卷精裝本樣書剛放到桌上，趙志強就以他雄厚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滿文感覺，一眼就看出書的封皮上滿文之錯誤，接著又連連發現錯處，他的迅速和精準，除了博得一片喝彩，還得到參評審專家們的一片讚譽。

特殊人才的特殊貢獻

歷史的機緣巧合讓趙志強感歎自己的幸運，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內從階級鬥爭為主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開發利用明清檔案為社會服務，剛剛畢業的趙志強一天也沒有耽誤，立刻就步入學術研究。

在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趙志強從事滿文檔案整理、翻譯和研究工作，埋首於浩如煙海的清代文獻資料中，翻譯出版大量書稿。《「滿文老檔」的整理出版大大促進了清史滿學研究，若是以往，這些檔案都還在庫房裡「睡大覺」，社

會上也很少有人問津。包括給外交部翻譯《俄羅斯檔案》，目前中國社科院正準備整理後公開出版發行。」他說。

隨着《滿文老檔》的出版，滿學研究跨入了一個新的時期。1991年3月，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成立，6個月之後，趙志強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調入該所，1996年擔任副所長，1997年擔任所長，在這個崗位上一幹就是15年。在全國社科院系統，趙志強所在的滿學所是唯一的專門研究滿學的機構，也是學界公認的滿學領域權威。

開關錫伯族研究新時期

多年以來，趙志強帶領滿學所組織召開了多場高層次、較大規模的學術會議，自1992年以來，滿學研究所約舉辦了12次較大規模的學術會議，其中以趙志強為主舉辦的就有7次。

在一次參加黑龍江大學的學術研討會時，來自伊犁師範學院的中國錫伯語研究中心主任在講到歷史上對錫伯族的研究時，盛讚趙志強和同事做出的成績。他認為，以趙志強為代表的對錫伯族的研究，絕對是錫伯族研究領域中一個開天闢地的新的發展時期。趙志強將《錫伯族檔案史料彙編》先後出版錫伯文版和漢文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亦對此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研究民族史

第一部最完備最系統的歷史資料。

趙志強還出版了《舊清語研究》、《清代中央決策機制研究》兩部學術專著，發表了學術論文六十餘篇。另外，還有合著三部、合作編譯史料三部。趙志強的論著，基本上是利用滿文檔案為原始資料，對清朝歷史深入探究，其中，施政建設、教育體制、廉政機制等方面的利弊關係對當今社會也頗有借鑒作用。這一點，使滿文滿語的研究不僅具有了歷史價值，更有了現實意義。



趙志強在新疆新源赤谷城考察。

本報北京傳真

滿學大家

清史權威



趙志強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本報記者凱雷攝

正值盛夏，在趙志強的書房澄懷軒，清茶一杯，坐談三時，如沐春風。趙志強是一位典型的具有中國傳統氣質的學者，談吐論證處處可見深厚學養。從滿學學術前沿，到學界熱研的清代軍機處研究，趙志強深究核心問題、還原歷史真相，闡述問題本質，給出前瞻性理論框架。滿學領軍人物盡顯大家風範。

油燈一盞 家學淵源

成為大家，係受教於大家——故宮深處冷板凳16年，滿學重鎮潛心研究又22載，滿文研究這一冷門終成海內外莫甚清史研究獨樹一幟的顯學。採訪時才得知，趙志強原來是地道的新疆錫伯族，從小家承淵源，貓冬時節，一盞油燈，幾代人圍聚一室，有時抄詩抄書、有時讀書吟誦，「我在家就沒打過牌，從小的消遣就是讀書、抄詩書，聽父親用很響、很有韻味的聲音讀史書和文學作品。」

趙志強小心翼翼地拿出藏於書櫃深處的厚厚一疊父親手稿，用滿語念給記者聽，「這些有的是在野外唱的歌，有的是父親自己寫的歌，還有錫伯族民間故

事集和父親隨手寫的雜記，手稿封面上還有父親親手畫的小鳥。有日本人和韓國人看到後，都表示出極大的興趣，說從未見過這樣珍貴的材料。」那上面以古老的滿文書寫着一個民族的史憶。他說，未來付梓出版是對已逝的父親、正在消亡的滿文最好的慰藉與傳承。

軍機研究 去偽存真

趙志強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六十餘萬字的專著《清代中央決策機制研究》不僅是海內外相關清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也成為一些中央高層領導偏愛之書。

這本基於滿文檔案二十年研究所成的力作何以受青睞，這其中不僅僅有現實因素，還有着更宏大的歷史背景。趙志強說，康雍乾盛世與「中樞決策密不可分」。

清代中央決策機制的核心，就是設置軍機處。趙志強在書中詳細論述了軍機處與內閣、理藩院等關係，以詳盡準確的事實破解有關軍機處是內閣分支機構、軍機處令內閣削權成「開曹」等種種誤解，平實寫就、娓娓道來，還原軍

機處的本來面目——與官僚化的內閣互補協同，成為大國中樞決策高效運作的治理標本。

趙志強認為，縱觀金清興替三百年，成敗攸關所繫者，莫過於中樞決策。其中的軍機處產生於應對邊境重大事變，發展於首腦治國理政專業、高效之需，終成常設機構。「清代中期的決策機構裡不僅集中了一批滿洲人才，還有蒙古族、漢族等各民族的優秀人才。有官無吏，扁平高效的決策機制，為清朝鼎盛打下制度基礎。」

清史研究 治國鏡鑒

以強大的滿文檔案為底，趙志強的清史研究揭示了中國古代治國安邦的規律。他長期的研究表明，清朝民族政策成功，除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外，很大程度得益於建立蒙古衙門——理藩院，該院尚書、侍郎多在軍機處行走，與中樞決策關係最為密切，更主要體現於獨自議奏民族事務，以此緩撫蒙古，超越前代僅以修長城自保，可謂真正的堅不可摧。而清朝自嘉慶始衰落72年，理藩院高官竟無一人入值軍機處，可見成敗要害所在。

炎熱暑日，趙志強又將帶領同仁再赴新疆，探訪滿學相關聯的遺址如伊犁將軍府等。去年，香港文匯報拜訪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他提及44位伊犁將軍不少都戰死邊疆。趙志強就此談到，治疆者有着深厚歷史感很是難得，今察清史尤其是清朝理藩院與伊犁將軍的設置，令清朝處理蒙回等民族事務好於前代。清朝的民族事務治理與中樞決策中的關係，值得治國理政者與決策智囊深思。

滿文申遺 刻不容緩

在清代，滿文作為「國書」，與漢文並用，因而形成了大量的滿文檔案、典籍、牒譜、碑刻等等，內容涉及清朝的內政、外交等諸多方面，堪稱極為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國際上從事滿學研究的機構遍佈日、韓、德、法、俄、意、美等國家，並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而中國的滿文專家數量偏少，能夠看滿文、懂滿文的人寥寥無幾。長此以往，若干年後，如何

證明滿文屬於中華民族都將成為問題。滿文申遺，刻不容緩。

趙志強指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北京以滿文申遺，有三大優勢。一是北京長期以來人才薈萃，高校和科研機構眾多，是中國乃至世界滿學研究的中心。二是滿文古籍文獻絕大部分保存在北京。三是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設有滿學研究所，該所多年來致力於滿學研究，舉辦學術會議，在海內外滿學界頗有影響。

傳據學：滿語研究新角度

記者採訪時，趙志強剛從黑龍江參加滿文學術研討會歸來，會上很多學者談及滿文研究的困境，比如如何突破「已無可研究」這一瓶頸，對此，趙志強給出了「從傳據學研究」這一新角度，令學界思路豁然開朗。傳據學簡而言之，即是從語言本身離事實遠近的角度，來研究滿文的表現形式，這既是滿文研究的新層次，其研究成果又會對人類任何語言貢獻學術價值，尤其是將對同一

體系中的少數民族語言如錫伯語等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傳據，趙志強解釋說，傳據就是研究信息的來源和獲取信息的途徑，意義在於能更加清楚地描述滿語本身，傳據關心的不是時間概念，而是獲取信息的途徑。同時，滿語是在滿一通古斯語言中很重要的語言，把滿語從傳據的角度研究得更完善，對滿一通古斯語族其他語言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作用。